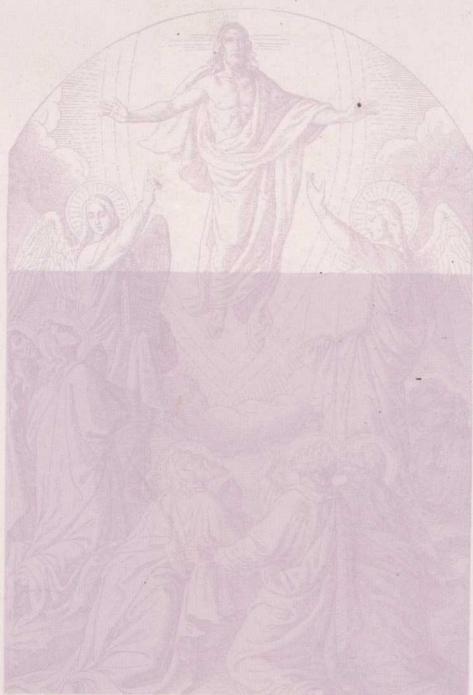


基督教经典译丛



何光沪 主编

Church History

# 教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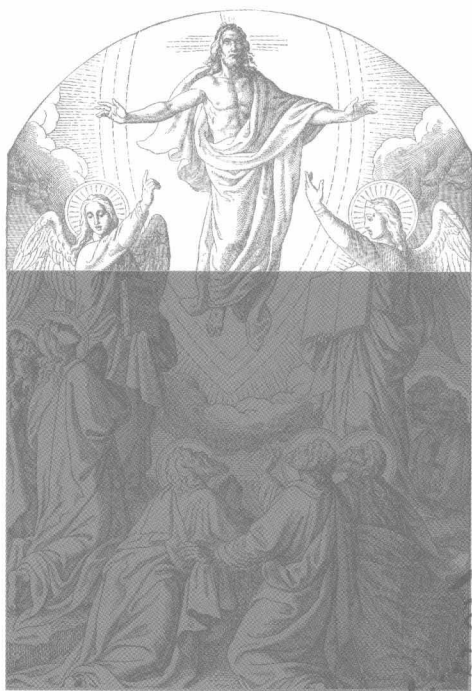
[古罗马] 优西比乌 著

[美] 保罗·L·梅尔 英译、评注

瞿旭彤 译



基督教经典译丛



何光沪 主编

副主编 章雪富 孙毅 游冠辉

Church History

# 教会史

[古罗马] 优西比乌 著

[美] 保罗·L·梅尔 (Paul L. Maier) 英译、评注

瞿旭彤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会史 / [古罗马] 优西比乌著; [美] 梅尔英译、评注;  
瞿旭彤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9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3206-5

I. 教… II. ①优…②梅…③瞿… III. 基督教史  
IV. B9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9318 号

丛书策划 橡树文字工作室

责任编辑 张艳华

责任校对 何 敏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9-251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4.75

字 数 397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基督教经典译丛

## 总 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 M. 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 J. 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

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

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文（John Calvin）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



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世纪），中古时期（6—16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17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2008年11月

献给肯考迪亚神学院全体师生

为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谨致谢忱

## 中译本导言

姚西伊

举凡伟大的历史著作不但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下过去发生的事情，更能够引起后人的思考与讨论。优西比乌的《教会史》(*The Church History*)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依我之见，保罗·L·梅尔(Paul L. Maier)在他的“引言”一开始对此书地位和意义的高度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在中国，历史学界对早期基督教历史的认识与研究也离不开这本关键性的著作。即以杨真撰写的《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为例，此书虽属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的出版物，全书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色彩甚为浓烈，但关于基督教史最初四个世纪的论述在材料上仍大量引用优西比乌的名著。80年代以降，可以说这种状况在国内史学界并未根本改变。

这部《教会史》对后人的影响不仅在于为我们保存和提供了关于那段时期教会的宝贵资料，而且还在于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后人看待那段历史的视野和视角，甚至我们的研究进路。此书着墨甚多的那些主教、护教家和神学家，那些罗马政府发动的大逼迫，以及那些殉道者的惨烈事迹，当然还有教会在君士坦丁当政时期的地位改变均成为日后历史叙述的主要构成部分。翻开优西比乌的这本著作和后世的大部分教会史，映入眼帘的**多**是一连串熟悉的大人物和大事件。可

以说,除了新约圣经所涉及的那段时期之外,日后相当多的历史学家是通过优西比乌的眼睛来看早期教会演变的。再以区域涵盖而言,正如很多评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对地中海世界东部的教会所给予的关注远远超过西部,更没有触及基督教在更为偏远地区的传播。优西比乌这样的处理当然与他的时代限制有关,譬如信息和交通往来的不发达。但他的视野和进路为后世占据教会史话语主导权的欧美史学家所继承,并大力发挥。即使是后来标准的基督教历史的陈述,虽然关注的主要区域由地中海沿岸扩大到整个欧洲,后来再把北美包括在内,但仍未超出我们今日所知的西方传统基督教世界,历史的叙述基本限制在早期的希腊与罗马,后来的欧美,沿着时间顺序作直线式的展开。这方面可作典型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会史家威利斯顿·沃尔克(Williston Walker)的《基督教会史》<sup>①</sup>。此书堪称教会史的现代经典之作,几经修订,流传甚广,但在论述早期教会历史时,其重点很清楚地放在希腊与拉丁世界的教会发展上面。对后来历史时期的叙述,也大致体现出西方中心论的取向。因此,我们今天在充分肯定优西比乌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传承早期教会历史的巨大功绩的同时,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他的历史观、视野和方法的局限性,特别是当其史观、视野和方法对后代的基督教史写作潜移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时候,就更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反思。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又见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教会在亚、非、拉地区的崛起和全球教会重心的南移,再加上多年来地区教会史研究成果的积累,所以优西比乌所指向的那种教会

---

<sup>①</sup>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中文版:孙善玲、段琦、朱代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史模式的种种缺陷在我们眼中正日趋明显。诚如当代美国教会史名家胡斯都·L·冈察雷斯(Justo L. Gonzalez)在他的近著中所指出的,那种以西方为中心,以时间为主轴,以精英为焦点的传统教会史进路日益与普世教会的现实脱节,正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摆在今日教会史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是重构教会史的思路和视角,使之真正成为跨地域、多中心、多阶层的普世大公教会的历史。<sup>①</sup>实际上,不少当代教会史家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有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推出。譬如由美国学者戴尔·T·欧文(Dale T. Irvin)和斯科特·W·桑魁斯特(Scott W. Sunquist)执笔的《世界基督教运动史》(*History of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之第一卷:《初期基督教到1453年》<sup>②</sup>,即刻意突破优西比乌《教会史》的地域视野,而力求描绘从西地中海到希腊、埃及,再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教会全画卷。就地区史而言,突出的作品可举出美国学者莫菲特所著《亚洲教会史》<sup>③</sup>。这些作品的出现已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早期教会史的了解,帮助我们在史料和方法上对优西比乌的《教会史》能够有所超越。所以,站在今人的角度,我们固然不必苛求于古人,但对优西比乌的《教会史》的地位与价值也应有一个更附和时代的认识与评价。在我看来,这部著作仍不失为一部关于早期教会不可或缺的资料集,同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本,让我们可以看到三四世纪之交一位希腊化世界的教会领袖是如何诠释教会历史的。记住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因为优西比乌那些与今日文化格格不入的思维、观点和措辞而大感惊愕。

无论我们今日如何评价优西比乌《教会史》的功与过,我们都不

---

① *The Changing Shape of Church History*, St. Louis, Missouri: Chalice Press, 2002.

② *Earliest Christianity to 1453*,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1.

③ Samuel Hugh Moffe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中文译本: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2000年。

得不承认他是一位**极赋**感染力的史学家。从早期教会惨遭血腥镇压，到几个世纪之后为罗马帝国政府所宽容、扶持和倚重，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优西比乌笔下的这段历史前后反差极大，**甚具**戏剧性，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由于他的生动记述，我们得以仔细观察基督教如何从一个被鄙视、被排挤的弱小群体，历尽艰辛，到最后成为主宰罗马文化和宗教生活的统治者的过程。或者说，在优西比乌的《教会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基督教形象：一个是那些为坚持信仰而遍体鳞伤、宁死不屈的殉道者的谦卑、坚贞和牺牲；另一个则是教会获得君王的保护与宽容之后的辉煌、强大与崇高。经过了优西比乌浓墨重彩的描绘，从一个形象向另一个形象的转变就显得那么吊诡和震撼。

其实，在君士坦丁手中开始的这个转变是一个基督教如何从罗马帝国社会与文化的边缘逐步进入到权力与影响的中心，从与帝国暴力机器相对抗到相结合的过程。对于基督教地位与角色的这一历史性改变，优西比乌给予了几乎是无以复加的肯定与赞美。在他看来，这无疑教会的空前胜利，是上帝意志的体现。用手中的权力改变了教会命运的君士坦丁，更是因此而蒙上帝的眷顾，并名垂青史。优西比乌对君士坦丁虽有吹捧之嫌，而为后人所诟病。不过，后世也有不少历史学家及其历史叙述虽放弃了优西比乌的溢美之辞，但仍沿袭了优西比乌的思路，而把君士坦丁的举措看作是基督教摆脱困境，走向胜利过程中的一座高峰，是教会的“最后成功”，揭开了教会发展的新篇章。<sup>①</sup>自君士坦丁时代开始，政教合一教会成为国教并占据文化和社

---

① 参看赖德烈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Vol. I: The First Five Centurie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37, Chapter IV.

会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逐步形成,并扩展到整个欧洲,在中古时期更把教会推上了凌驾于王权之上,万流归宗,一统天下的崇高地位。前前后后,这“基督教王国”盘踞欧洲一千余年,又在近代以来,藉着西方的海外殖民扩张不同程度地伸展到其他地区。在传统的主流历史叙述里,“基督教王国”的概念和说法一般是以一种正论出现的,鲜有对其的挑战与批评。这其实正反映出优西比乌的思维与论断对后人的影响之大。

自17世纪到19世纪,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近现代社会民主化、理性化、世俗化和多元化的持续过程。基督教不但相当迅速、彻底地丧失了政治的特权,而且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也在各种思潮和宗教的竞争下摇摇欲坠。教会被非国教化(disestablishment),从而退出社会权力和文化影响的核心,再度回到边缘地位,成为多元化社会中的一元。换句话说,“基督教王国”已经和正在破碎,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过程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在优西比乌式的史观看来,这种状况出现与深化正是教会的失败与悲剧。不过,近代以来在国际教会史学界,也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对“基督教王国”的模式提出了批判。前面提到过的冈察雷斯又可作为其中的一位代表。考新约圣经当中耶稣的本意,又参之以基督教一统天下在教会内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冈察雷斯对优西比乌的进路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基督教的恰当位置并非社会与文化的中心,而在边缘,所以教会的身份应当是“边缘化的道成肉身”(marginalized incarnation)。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自从优西比乌写作他的《教会史》那时起,教会就处于权力和威望的中心。君士坦丁支持它。狄奥多西(Theodosius)把它立

为国教。到了奥古斯丁的时代，政治中心在日耳曼入侵面前土崩瓦解，奥古斯丁重新解读历史，使得上帝之城可以超越世事沧桑，始终屹立于中心。自此之后，教会总是依自身处境，在这两种范式中摇摆……

当我谈到边缘化的道成肉身时，我的意思是，归根到底基督徒必须承认，作为个人和教会的恰当位置不一定是在中心……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们的恰当位置在边缘，而非中心；在山谷而非顶峰；在十字架而非君王宝座。<sup>①</sup>

如此看来，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时代开始与政治势力相结合，先是沦为皇权的附庸和工具，后又在大半个欧洲升上权力的顶峰，这个历史现象并非基督教的辉煌。实际上，基督教本质的东西在其中多有丧失。而近代“基督教王国”的破碎不但不是基督教会的损失，反而是其转机。这一历史转变迫使教会重返早期教会的社会地位，因此而有机会重新思考自身定位和方向。无论我们对冈察雷斯所代表的思潮如何评价，都必须承认它帮助我们对优西比乌《教会史》的特定史观的认识更为冷静、多面和平衡。它把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地位的巨变给教会自身及其社会影响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放在教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这些后果是否有违基督教信仰的初衷？回首以往，放眼未来，它们又能给我们哪些启迪？在津津乐道于教会君王地位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要同样重视殉道者们的鲜血呢？与金光灿灿的皇冠相比，十字架和荆棘冠对我们是否意味更为深长呢？

---

<sup>①</sup> *The Changing Shape of Church History*, p151, p153.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优西比乌所记载的这段历史的看法经历过比较大的变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主要从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诠释君士坦丁的政策调整。杨真的著作是这种进路的一个典型。他把基督教获得宽容，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说成是“新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103页）结果“教会与统治集团结成一体”。（113页）他还曾把优西比乌称为君士坦丁大帝的“宠信”。（21页）到了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学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进路已呈现多元的格局，除传统史学进路之外，从文化演变和转型角度的探讨相当流行，也有从神学思想史角度切入的。同时，对基督教地位转变这件史实的正面评价多了起来。

显而易见，这些新进路和评价的出现与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中所突显出来一些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有关。自80年代之后，宗教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生活中的复兴与回潮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诸种宗教当中，又以基督教的成长最为迅速。基督教由文化大革命前后一个规模甚小、处于半秘密状态的宗教群体，演变到今天要面对如何进入主流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关注此问题的论者常常会引用早期基督教的这段历史，把教会如何融入罗马主流文化作为一个成功的范例来论证，以期为当今中国基督教界内外人士提供借鉴。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有些论者对早期基督教地位改变的肯定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譬如，有的学者在论证今日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要加强与传统文化、社会现实的适应性时，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教会来说，它的神学思想越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就越能促进自身的发展”。早期教会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早期教会因未能对信仰进行理性论说，和初期仪式的神秘性，使得罗马皇帝误认基督教是一“秘教”运动而采取遏制政策。但经过早期护教士们的努力，“基督教得以在辉煌的希腊罗马